

主编 王功安 毛磊

周恩来

ZHOU ENLAI

与国共关系

YU GUOGONGGUANXI

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

G G X Y L A G X C S  
G L G

王功安 何又明 张亮东 著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社

K827

187

0111418

GGGYLAGXCS

ZHOU ENLAI

# 与国共关系

YU GUOGONGGUANXI

王功安 何又明 张亮东 著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恩来与国共关系/王功安,何又明,张亮东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3.8 ISBN 7-5430-2868-9

(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王功安,毛磊主编)

I. 周… II. ①王…②何…③张… III. ①周恩来(1898~1976)一生平事迹②中国共产党—关系—中国国民党—史料

IV. ①K827=7②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2272 号

书 名:周恩来与国共关系

---

著 者:王功安 何又明 张亮东

责任编辑:孙 敏 肖德才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印 刷:湖北省通山县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2.5 字 数:313 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册

ISBN 7-5430-2868-9/K·249

定 价:25.0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

**顾问** 程思远 彭清源 张静如

**主编** 王功安 毛磊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     |     |     |     |     |
|-----|-----|-----|-----|-----|
| 王功安 | 毛磊  | 田克勤 | 刘秀庭 | 陈奇文 |
| 陈孔立 | 余克礼 | 余汉康 | 何又明 | 肖德才 |
| 张广信 | 张同新 | 张宪文 | 林家有 | 周兴梁 |
| 范小方 | 胡继堂 | 欧可平 | 哈经雄 | 郭昭烈 |
| 黄修荣 | 彭小华 | 曾宪林 | 燕天甲 | 魏联方 |

## 总 序

这套丛书定名为“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

我们编写出版这样一套丛书的愿望由来已久：一方面我们在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国共两党关系通史》以后，感到这方面的内容浩博，要研究的问题多，难度大，需要推动和组织全国各地专家、教授集体攻关，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另一方面，自1988年在武汉召开了全国首届国共两党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之后，许多专家、教授不仅经常来函、来电，而且在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的历届讨论会上，都要求我们主编一套丛书。于是我们开始酝酿编写工作，并于1993年4月，制订了“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的编写方案。

我们之所以积极组织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主要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结束两岸分离状态，和平统一祖国，是几代人的历史使命，是一项长期而又艰难的系统工程，有许多工作要做，研究工作当然不可缺少。国共关系和两岸关

系研究著作的出版,不仅可以发挥宣传舆论的导向作用,使两岸人民认识祖国统一的必要性、必然性和现实性,下定决心,充满信心,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而且还可以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掌握规律,为制定和执行党的对台方针政策,提供历史的、现实的和理论的依据。二是推动这一新兴学科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自20年代以来的70多年间,国共两党关系曾经是一个重要问题,40多年来,两岸关系更是一个重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两个关系”的研究却被视为禁区,形成空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8年以来,这项研究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成为研究的热门课题。当然,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全面、不深入。编写出版这套丛书,无疑可以促进这项研究有目的地、长期地开展下去,加快这一新兴学科的繁荣和发展。这样,就可以围绕这个与祖国息息相关的重大课题,全面地综合整理资料,系统地、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和概括,填补空白,建立科学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是可想而知的。

鉴于这项研究工作意义重大,内容广泛,任务艰巨,旷日持久,我们在组织研究队伍时,注意了老中青结合。除了邀请一批著名的老专家、老教授参加外,还吸引了部分中青年学者参加,以老带青,寓培养人才于学术活动之中,力求既出成果,又出人才,保证这项研究后继有人,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们主持编写这套丛书，既不是单纯地研究国民党，也不是单纯地研究共产党，而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 70 余年的国共两党关系；既不是单纯地研究台湾，也不是单纯地研究祖国大陆，而是侧重研究 40 余年的海峡两岸关系。总之，我们的着眼点是从各个时期、各个领域、不同的侧面研究“两个关系”问题，既从纵的方面开展“两个关系”史的研究，又从横的方面开展“两个关系”论的研究，以论为主，史论结合。丛书初定 20 本，每本 25 万～30 万字。编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努力揭示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发展的规律，力争做到体系科学，内容丰富，观点正确，资料可靠，语言畅达，融科学性、理论性、可读性于一体。

编写出版这套丛书确非易事，不仅要解决组织力量、选好课题、搜集资料、分工撰写、审稿定稿等问题，还要解决经费问题。由于长时间的努力和多方面的争取，这项工作得到了有关单位、领导、朋友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因此我们才克服了不少困难，解决了不少问题，终于将编写出版丛书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我们要感谢全国台湾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感谢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武汉市委统战部、武汉市台办和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感谢程思远、阎明复、彭清源、张静如等同志，感谢湖

北省商业厅厅长王炳南同志、武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干臣同志、武汉国赢房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冠初先生和湖北新兴国际会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国政先生。没有他们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丛书是难以完成的。编写出版这套丛书以及开展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许多问题要解决,我们殷切期待丛书的出版,会引起更多的单位、朋友的重视和关心;我们衷心希望这项工作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和帮助。

编写出版这套丛书属于一项崭新的工作,理论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困难较大,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掌握的资料不全,难免出现不周到、甚至舛误之处。在此,竭诚欢迎全国专家、教授、统战工作干部、对台工作干部、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功安 毛 磊

1996年4月于武汉

## 前 言

本书主要是研究周恩来与国共关系，特别是研究周恩来在国共两党关系中的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要研究周恩来在国共两党关系中的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就不得不从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重要性开始。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联合光复会组成了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的成立，使分散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领导核心的全国统一组织，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

1921年7月，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齐集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一对双生子。国共两党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在很长时间内，国共两党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影响最大、起支配作用的两大政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所有政党关系中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它们的合作与对立，对中国历史的进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这两次合作，都对民族复兴、国家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大革命高潮，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一改中国人民近百年

在反帝斗争中屡战屡败的局面，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拯救了中华民族，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不仅成为中国 70 余年整个历史的重要内容和一条主线，而且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决定和影响着中国 70 余年历史的发展和分期。纵观中国近百年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重大的政治运动、思想文化运动、军事斗争、经济建设以及外交活动等等，大都是由国共两党先后组织、领导的，都与国共两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活动有关，与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关。早在 1937 年 9 月，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 1924 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sup>①</sup>可见，国共两党关系，在很长时间内，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一个左右中国历史进程、关系中国全局的重要问题，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民主革命时期，决定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社会主义时期，关系着祖国的统一与振兴。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如此重要的国共关系，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必然涌现出一些突出的领袖人物。他们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在国共两党合作与斗争的过程中，做出丰富多彩的表演。他们在国共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起着巨大的进步作用或反作用。周恩来就是一位在国共关系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起着特别巨大进步作用的杰出领袖人物。

周恩来在国共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与巨大作用与有些领袖人物相比，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第一，周恩来一生是在同国民党打交道中度过的，他做国民党的工作不仅起点比较早，而且时间比较长。**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36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早在1923年6月，周恩来就在欧洲，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与孙中山派来的国民党旅法代表王京歧进行谈判，达成了合作协议。旅欧的党团员共80余人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后，周恩来先后担任了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和代理执行部部长的职务。他在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筹建国民党旅欧支部以及推动和领导旅欧国共两党组织进行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还较早地撰写和发表了一些阐述国共两党关系的文章，例如1923年8月周恩来写给王京歧的信，1924年上半年周恩来连续在《赤光》发表的《革命救国论》、《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文章，都对国共关系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初步阐述。

周恩来不仅担任国民党的职务、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的起点比较早，而且同国民党打交道的时间比较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都在做国民党的工作——同国民党合作或斗争，从未间断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周恩来长期担任政务院——国务院总理，是新中国的总管家，再加上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设立对台工作办公室，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所以周恩来一直领导对台工作，继续同国民党打交道。他先后十多次代表中国对美国政府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发表声明，提出控诉，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美国的侵略行为，促使安理会把中国提出的议案列入议程，并邀请我国派人出席参加讨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决议，扩大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他组织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并利用美蒋矛盾，实行“联蒋抵美”，粉碎了美国企图霸占台湾、“划峡而治”的阴谋；他适时地提出采用

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找人向台湾当局传话,托人向国民党领导人写信,宣传和阐明中共的对台方针政策,表达了中共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共同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的真诚愿望;他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赢得了国际社会对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承认和积极支持,并促使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为和平统一祖国创造了重要国际条件;他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行和平统一,并将中共中央对台方针政策综合概括为“一纲四目”,初步绘制出祖国和平统一蓝图,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采取利用亲友联系促进两岸相互了解、保护好蒋介石和陈诚等人的祖坟及照顾好他们在大陆的亲属、主动做好国民党元老工作、妥善安置特赦人员和回归人员、精心布置争取李宗仁回国等各种途径积极开展对台(对国民党)工作。直到1975年9月4日周恩来病重住院时,还坚持抓对台工作,他就9月3日《参考消息》转载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该文分析了当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了蒋经国的经历及其他情况——编者注)一文批示,要罗青长、钱嘉东找王昆仑、屈武等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批语最后,周恩来用颤抖的笔迹连写下四个“托”字。可见周恩来对做好国民党的工作,争取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第二,周恩来无论是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在国共分裂时期,都是处在同国民党团结或斗争的第一线。**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周恩来除了在中共党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外,还先后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军法处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国民党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国民

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务。参与领导了黄埔军校的建校、国民党的建军和两次东征以及平息杨、刘叛乱。主持了建立和巩固东江地区革命政权、整顿建设东江的工作，还参与准备北伐，积极支持北伐战争。同时，在这个时期的后期，他还亲自出面，反对蒋介石策划的中山舰事件，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在国共第一次分裂时期，周恩来首先是针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以中央军委领导人和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赶赴南昌，果断地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后来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组织领导了攻打漳州的战役。与朱德率部反对蒋介石的“围剿”，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创造了红军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遵义会议后，新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周恩来为团长，与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为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他还多次东渡黄河，协助毛泽东部署红军主力东征作战。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周恩来一直承担着同国民党谈判的重任。先是同张学良在东北军驻地肤施天主教堂会谈，接着又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身份率团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然后代表中国共产党奔忙于延安与西安、南京、上海、庐山之间，同蒋介石及其代表商谈合作抗日事宜。同时，周恩来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赴山西与阎锡山谈判，提出平型关、忻口作战方略，推动山西全面抗战。他还任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在武汉开展军事统战工作，并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多次与白崇禧会晤，为徐州会战献计，帮助李宗仁、白崇禧取得了台儿庄大捷。国民党政府到重庆后，周恩来经长沙、衡阳、桂林到达重庆，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继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

作，并领导南方 10 省及港澳地区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前夕，周恩来又与国民党谈判成立联合政府问题。1944 年 11 月，同美国大使赫尔利由延飞渝，同国民党商谈具体实现联合政府问题。不久，他又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同毛泽东、王若飞一起代表中国共产党自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10 月 10 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双十协定》上签字。接着，周恩来又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停战三人委员会，同马歇尔（代表美国）、张群（代表国民党政府）协商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问题。此外，在这个时期，周恩来还直接领导华南敌后艰苦复杂的抗日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

在国共第二次分裂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47 年兼代总参谋长），成为毛泽东的第一位军事助手、副帅。协助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1947 年 3 月至 1948 年 3 月，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一部分工作人员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余里，粉碎了蒋介石、胡宗南的进攻。同时，周恩来在转战陕北时，不仅参与指挥着陕北战场的作战，而且参与指挥着全国战场的作战，他协助毛泽东指挥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南下，展开了全国性的战略大进攻。他还协助毛泽东指挥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摧毁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奠定了基础。周恩来还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领导了“第二战场”的全部工作，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作为中共首席代表率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双方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谈判宣告破裂，暴露了国民党“和谈”的虚伪性，使国民党“划江而治”的阴谋破产。经周恩来等真诚挽留，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留在北平，参

加新中国的成立与建设。他还具体指导绥远、湖南、云南、新疆等地的和平谈判,致使这些地方相继和平解放。

**第三,周恩来既是国共关系重大决策的组织实施者,又是重大决策的出谋划策者,还是国共关系理论的提出者。**

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从1927年5月担任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府总理26年,是世界各国中担任总理职务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他还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长达21年之久。他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周恩来在党和国家的这种牢固的领导地位,再加上他那种超群的学养、才华、胆略、智慧、性格、品质和风度,就决定了他在国共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

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关系方面的重大决策的主要组织实施者,他参与领导或直接指挥了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共关于国共关系重大决策的组织实施。例如1927年3月,周恩来为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在上海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迎接北伐军进上海的决策,立即与特委研究决定,将上海划分为7个区域,分别安排得力干部担任起义的负责人,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周恩来亲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任副总指挥,他们亲临闸北(北洋军阀部队集中的地区)指挥战斗,使北伐军不折一兵不费一弹进入了上海,使中国的城市武装起义第一次取得了成功。又如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周恩来率领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按照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对各方面人士做了大量工作,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八项条件,联共抗日。

这对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周恩来还根据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敏捷地、适度地处理了国共关系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例如1925年5月,对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及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的罪行,他采取了发动群众和动用校规的办法进行了公开揭露和处理。1926年3月,对蒋介石策划中山舰事件,周恩来立即找到蒋介石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事后,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采取退让政策的情况下,他还通过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了《公开信》,揭露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造谣诬蔑。1937年7月,对上海、太原相继失守后国民党内出现的妥协和现象,周恩来立即就反对妥协和,坚持华北抗战,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我军,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等问题,在临汾向北方局作了具体指导和部署。1938年11月,对国民党制造“长沙大火”,实行“焦土抗战”,使长沙古城成为一片废墟问题,周恩来当即痛斥国民党的这种“焦土御敌”是毁国害民(大火烧毁民房5万多栋,民众死伤2万多人),并向蒋介石据理力争,提出三条善后办法,迫使蒋介石下令枪毙了直接责任者长沙警备司令等3人;拨款50万元救济灾民。周恩来还在敌机临空侦察的险境下,亲自主持了50万救济灾款的发放。1941年1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高潮,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针锋相对向国民党提出义正词严的抗议,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同蒋介石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谈判斗争,既给顽固派以有力的反击,又避免了国共关系破裂。

周恩来又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关系方面的重大决策的出谋划策者之一。他除了参与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关于国共关系重大决策、政策的制定外,还代党中央起草了许多关于国共关

系方面的文件、指示。例如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亲自写了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意见书，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挽救革命（意见书未被中央采纳）。1929 年 9 月，代党中央起草了《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后，又与陈毅一起代党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1933 年 1 月至 3 月，周恩来给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写了《关于粉碎第四次“围剿”的电报》共 9 件，提出了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1937 年 7 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实现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纲领和四项保证。1945 年 8 月，先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 14 条“紧急要求”的文件和《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揭穿蒋介石的欺骗阴谋》的电报，即给重庆局的指示电。1946 年 11 月，起草了《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1947 年 2 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在开展三大战役的日子里，周恩来是最忙的中央领导人，仅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文就达 86 篇。1955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了亚非国家历史上第一次政府首脑会议，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会上再次强调了“五项原则”，并阐明了对台湾的立场，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仅从以上这些不完全的事例，可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对国共关系的决策方面，一直是运筹帷幄、出谋划策者，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突出的。

周恩来还是国共关系理论的提出者之一。他富于理论创新，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国共关系方面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撰写出一系列的文章。据初步统计：《周恩来选集》共包括周恩来的著作 116 篇，其中与国民党和国共关系有关的著作或提到国民党和国共关系的著作就有 58 篇；《周恩来政论选》共包括